

社会性别研究译丛

复旦·密歇根大学社会性别研究所 编

丛书主编 陈雁 王政

社会性别与社会读本

Gender and Society: A Reader

主编

冯芃芃

郑岩芳

本书旨在通过对一些具体问题的讨论勾勒出女权主义学术发展过程中经历的论辩、思考和自省，提供一个管中窥豹的机会，向读者呈现当前国外女权主义学术研究在进行知识生产时的认真、严谨和活力。

社会性别与社会读本

Gender and Society: A Reader

《社会性别与社会读本》从女权主义与社会性别对社会与知识生产的影响、女权主义的去中心化、酷儿问题、全球化等角度呈现女权主义学术不断延展的关注领域，并对“社会建构”这一经典的女权主义命题进行重新思考。

ISBN 978-7-5426-3341-5



9 787542 633415 >

定价：48.00元

社会性别研究译丛

复旦大学密歇根大学社会性别研究所 编

丛书主编 陈雁 王政

社会性别与社会读本

Gender and Society: A Reader



冯凡凡 郑岩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性别与社会读本/冯芃芃,郑岩芳主编.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0.12

ISBN 978-7-5426-3341-5

I. ①社… II. ①冯…②郑… III. ①女权运动—文集 IV. ①D44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84159 号

社会性别与社会读本

主 编 / 冯芃芃 郑岩芳

责任编辑 / 黄 韬

装帧设计 / 徐蕾娜

监 制 / 任中伟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0031)中国上海市乌鲁木齐南路 396 弄 10 号

<http://www.sanlian.com>

E-mail: shsanlian@yahoo.com.cn

印 刷 / 上海叶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640×960 1/16

字 数 / 380 千字

印 张 / 28

书 号 / ISBN 978-7-5426-3341-5/C·373

定 价 / 48.00 元

丛书编者前言

“社会性别研究译丛”的出版动议起于 2005 年,它精选自中国大陆第一个社会性别学博士课程班的系列教材。2005 年初,由密歇根大学妇女学系王政教授牵线,复旦大学与密歇根大学高层领导面晤商谈两校全面合作协议。王政教授提出的设立两校合作的社会性别研究所和开办中国第一个社会性别学博士课程项目的动议得到了两校高层的共同认可。该项目争取到路斯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的慷慨资助,于 2006 年开始面向全国招生。

这一中国大陆首个社会性别学博士课程项目包括七门核心课程,共计 21 个学分课程内容涉及女权主义理论、女权主义研究方法、社会性别与历史、社会性别与社会、社会性别与文化、性别文化和生命的政治、跨国女权主义。这七门课程全部由美国一流大学的教授主讲,由国内青年学者担任助理教授。这七门课程和任课教授分别是:

“女权主义研究方法”,卡罗·波德(Carol Boyd),密歇根大学妇女与社会性别研究所所长、护理学院教授;

“女权主义理论”,塞东尼·史密斯(Sidonie Smith),密大的学院荣誉教授(Martha Guernsey Colby Collegiate Professor)、英文系系主任;

“社会性别与社会”,朱迪思·斯泰西(Judith Stacey),纽约大学教授;

社会性别与社会读本

“社会性别与历史”，王政，密大妇女学系和历史系教授；

“性别文化和生命的政治”，刘禾，哥伦比亚大学比较文学系学院荣誉教授；

“社会性别与文化”，派茨·雅格(Patricia Yaeger)，密大英文系学院荣誉教授(Henry Simmons Frieze Collegiate Professor of English and Women's Studies)和薇乐芮·查博(Valerie Traub)，密大英文系教授、妇女学系系主任；

“跨国女权主义”，伊丽莎白·温戈茹伍(Elizabeth Wingrove)，密大政治学系教授。

近十年来，众多国内高校教师热情地推动发展、建设全新的妇女与社会性别学课程，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约有近百所大学(占高校总数的十分之一)开设了妇女学课程。但迄今为止，这些繁荣与发展并未得到主流学界的充分认可与尊重，妇女学者执著的“社会性别主流化”的努力仍在学界与高等教育界的边缘徘徊；而学界对妇女学学科合理性、合法性的质疑随处可见。妇女学和社会性别研究要想在中国得到长足发展，学科化、体制化迫在眉睫。

从妇女学在美国高校的发展历史来看，妇女学在高校学科化，建立自己的系、所，培养自己的博士生，对于妇女和社会性别学科建设意义重大。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09年，美国有692所大学设有本科专业的妇女学系或中心，有51所大学可授予妇女学的硕士学位，15所大学在培养妇女学的博士。作为美国妇女学教育重镇的密歇根大学，它所采取的相关系科与妇女学系共同培养博士研究生的模式，因为易于向传统高等教育体制和传统学科渗透融合，也显得更有活力。

反观中国的高等教育领域，妇女/社会性别学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类似“妇女研究中心”的机构在各地高校随处可见，但绝大多数以课题研究和妇女维权为主要工作，并不直接参与妇女学教学实践和高校课程内容改革。虽然大量的与妇女相关的课程在本科与研究生层面开设，但受

制于教育体制与传统学科设置,课程难以全面规划,教授没有交叉合作,在各校零星开设妇女学课程的教授往往缺乏体制支持。除中华女子学院这样的女子院校之外,成立“妇女学系”几乎成了中国妇女学者遥远的“理想国”。“妇女学”和“女权主义学术”引以为豪的创新性、挑战力也因此大打折扣。^{〔1〕}

与学科的体制建设举步维艰同时并存,束缚妇女与社会性别学课程在中国迅速发展的一个主要挑战是相关师资力量的稀缺,难以满足全国各地高校学生对这一新兴知识领域的渴求。以社会性别理论为框架的各类学术研究尚未进入中国的人文社科学术领域主流,即使在冠名为“妇女学”、“女性学”的课程中也并非都具有清晰的女权主义学术理论和立场。“打着妇女/性别学的旗帜,在高校课堂照搬各种旧的等级架构或继续制作女性气质、延续性别不平等的课程、写作还很有市场;即使那些想用新的理论、方法来进行变革的学者,也处于革故布新的‘挣扎’和无所适从的痛苦中。”^{〔2〕}要巩固与发展这一新生的学术领域,迅速地在高层次培训一批青年学者变得至为重要。中国的妇女与社会性别学科发展需要一批有扎实学术基础和全球视野的学者,来担当各自学科的发展和在中国知识构成的转变中的学科带头人。复旦—密大社会性别学博士课程班正希望能够在这一层面有所助推。

作为一次中美合作办学的实践,复旦—密大社会性别学博士课程班的全部主讲教授均来自美国高校,所选用的阅读材料多由英文撰写,多数课程的授课语言也是英文——这使学员们能够有机会接触英语世界的最新学术前沿,但是“翻译”也就成了教学实践中遇到的最大挑战。正如刘禾教授的“跨语际实践”(translingual practice)理论所强调的,我们同样

〔1〕 北京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等少数院校经过多年努力,在社会学系下面设立了妇女学的硕士点,但至今未有任何一级或二级学科下设有妇女学的博士点。

〔2〕 杜芳琴:“妇女学在中国高校:研究、课程和机制”,《社会性别》第3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需要在教学实践中不断考量东西方跨文化诠释和语言中介形成的可能性,就这种“跨语际实践”对教学过程的深刻影响抱有足够的警惕。^{〔1〕}中国当代妇女学科的建设、女权主义及社会性别理论的传播在很大程度上受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影响,得益于西方相关学术研究成果,这一点无需回避,也无法回避。近年来,中国学界对于妇女学理论及教学本土化的反思方兴未艾,这个博士课程班的开办也正是希望在博士生培养层面真正践行本土化的实践——显然这一挑战是巨大的。

近年来全国各地不少高校掀起了编辑、出版妇女与社会性别课程教材的高潮,这批教材对于推进高校的妇女学学科建设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我们也看到,这批教材主要针对本科教学,多停留在对基本理论的介绍与普及阶段,对于国际学界近年前沿学术研究成果的介绍颇为欠缺。而教材的编定与出版,对于在高校确定女权主义话语的合法性,尤为重要。教材的质量不仅直接关系到教学的成败,更将影响到妇女学在高校的地位与发展前景。

复旦—密大博士课程班所使用的教材、阅读材料绝大多数来自英文语境,教材与阅读材料的编排、翻译耗费了项目组大量的财力与人力,我们对于以英语世界(不仅是西方)最新学术成果为核心教学内容的坚持,基本得到了学员的认同。我们的这种坚持首先得益于授课的美方教授对英语世界最新学术成果的熟稔,而他们深入浅出的解读更是中国学员获益的主要源泉之一。

这种坚持还基于我们对当下国内妇女学科建设的反思,面对英语学界理论与研究成果绝对的强势,光靠摇晃“本土化”的大旗常显底气不足;而对于国际上妇女与社会性别学各相关学科、具体的学术成果的了解、分析、吸收和批判却远嫌不够。社会性别学术在全球各地区发展迅速,在这一学术大背景中,博士课程班七门课的任课教授都不约而同地关注到了

〔1〕 参见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宋伟杰等译,三联书店,2002年版。

全球女权主义和女权主义地方化的问题,并自觉地将这些话题引入课程阅读与课堂讨论,介绍了不少研究世界各地社会性别议题的女权主义学术成果。

近代以来,“翻译”一直是中国学术界的重要问题。中国女权主义学者若欲在知己知彼的前提下开创中国的妇女与社会性别学,“翻译”显然是一个虽然痛苦,但却不可逾越的相伴过程。因此,我们丛书中的一种就是讨论“女权主义在中国的翻译历程”。而我们的这个博士课程项目更是一次艰难的“跨语际实践”,在这里翻译不再是语言之间意义转换的问题,而是来自不同学科和文化背景的学者对女权主义学术理论以及社会实践的探讨、争辩和反思。它对于发展中国的妇女与社会性别理论,最终实现社会性别学科的“本土化”,意义深刻而重大。

我们清醒地看到,妇女/社会性别学学科建设、培养中国自己的妇女/社会性别学学术力量任重而道远,在中国高等教育体制、教学内容发生急剧变化的当下,也正是妇女/社会性别学科进入中国教育主流的契机。在高等教育的社会功能发生转变的时代,教什么、怎么教、谁来教等问题,已经成为新的关注焦点。我们希望这套丛书的翻译与出版能使博士课程班在传统大学内部培育女权主义学术阵营的努力得到几何级数的放大。

七门课程中有两门教材未能纳入这套丛书。因出版计划的变动,《女性主义研究方法》双语教材已经在2007年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孙中欣、张莉莉主编),而《女权主义理论读本》由艾晓明教授主编,2006年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这两本教材是密大、香港中文大学和中华女子学院联合举办的妇女学研究生课程班(2002—2004年)上的阅读材料,这两门课亦由密大教授主讲。为了避免重复和浪费宝贵的翻译人力与出版资源,第一批收入这套丛书的读本共计五本:《女权主义在中国的翻译历程》(王政、高彦颐主编)、《男性研究》(王政、张颖主编)、《社会性别与社会读本》(冯芃芃、郑岩芳主编)、《社会性别与文化读本》(卢丽安主编)和《跨国女权主义研究读本》(李旭、郑岩芳主编)。

这套丛书能够出版需要感谢的人实在太多,最需要感谢的当然是王政教授,如果没有她在中美间穿梭奔波、运筹帷幄,就绝对不会有我们这个博士课程项目,也绝对不会有这套丛书的出版。我在这里还一定要感谢路斯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的大力资助,使我们在丛书文章的版权购买、翻译费与出版经费上得以后顾之忧。路斯基金会葛海伦女士,福特基金会北京办事处的何进先生和孙巍女士对我们这个团队和我们的工作所给予的理解、信任与帮助,点滴在心。感谢上海三联书店对于丛书出版的支持。两位学长陈恒、陈新教授不辞辛劳,居中联络,是丛书重要的催生者,在此一并致谢。

笔者不才,忝居丛书主编,在此更要对参与这套丛书的选材、翻译、编撰、版权等等工作的众多中美学者表示衷心的感谢。正如王政教授在《女性主义研究方法》一书的序言里说到的:女权主义“学术的发展是一项集体的事业,只有更多学者的共同参与,妇女与社会性别学才可能在中国有长足的发展”。同样,作为一项参与行动,我们诚恳地期待着读者对这套丛书的意见反馈,敬请您将意见与建议发至:umfudan@gmail.com。

陈雁

2010年3月于复旦光华楼

前 言

本书所选录的文章,来自2007年8月“社会性别学博士课程项目”的核心课程之一“社会性别与社会”。该课程项目由美国密歇根大学妇女学系和复旦—密歇根大学社会性别研究所合办,“社会性别与社会”一课的主讲教授是美国著名的女权主义社会学家、现任职于纽约大学的朱迪思·斯泰西(Judith Stacey)教授,一位亲历了自第二次浪潮以来女权主义学术在美国发展全过程的杰出学者。

女权主义第二次浪潮以来的发展与1970年代发生在美国和欧洲的社会运动息息相关。在诸如民权、反越战、反主流文化、自由言论等运动中,年轻人积极参与,反思主导文化中的权力关系。许多女性参与上述各项运动,却发现作为女性的她们遭受男性活动家的轻视、利用、压迫。在这样的背景下,妇女学学科与妇女权利运动相伴出现,反思妇女遭受不平等待遇的社会文化机制。70年代的女权主义者中,既有受到妇女权利运动激励投身学术研究的学者,也有受到运动影响而参与政治运动的活动家。一些有影响力的著作问世,其中以《女性的奥秘》为代表,对中产阶级白人妇女“不可名说的问题”进行剖析,鲜明地反对妇女放弃工作、成为全职母亲和家庭主妇。自此,女权主义者对各种过去被认为理所应当的立场、观点、态度进行挑战和反思,深入剖析其中蕴含的“男性中心”思考,在文化再现、知识生产、社会习俗等各种领域中发现无处不在的性别歧视。

同时,女性主义学者们不断思考一个问题:女性为什么处于从属地位,可以在什么地方、通过什么方式改变这种从属身份。

女权主义从反对生物决定论开始,否认男女位置的差别源于天生的差异,并提出生理性别/社会性别制度的概念,于是社会性别成为一个重要范畴,开始讨论知识话语如何建构社会性别。“社会性别与社会”这门课程的设计思路从关于自然差异是否意味着天生的劣势出发,围绕“生理性别/社会性别”二分的兴起与衰落展开。本书的内容遵循朱迪思·斯泰西教授所做的课程大纲设计,所选文章均来自课程的主要阅读文献。斯泰西教授开始进行女权主义研究时,关注的是家庭问题,家庭组织和家庭中男性的优越位置;她的研究兴趣主要在于社会转变、家庭转变对妇女、性别和性存在的影响。因此,在设计本课程时,她的宗旨是从自己的研究出发,结合自己的研究兴趣,把女权主义学术在过去30年的发展过程中基于与各学科的对话形成的自省、反思传统呈现出来。早期女权主义着重讨论性别二分的问题,尤其重视社会性别中男人女人、男孩女孩的差异,以及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的差异。随着关于种族、阶级、族裔、性存在、国家、健康等各领域讨论的深入,基于不同立场发出了种种对性别二分的批评之声,女权主义学者们逐渐认识到:差异不仅存在两性之间,也存在于每一个曾经被以为“铁板一块”的群体内部——包括男人、女人、黑人、同性恋人群等等。于是,批判性的交叉作用(critical intersectionality)备受关注,在此推动下,关于社会性别和性存在的学术研究进入全球化视角。当社会政治经济环境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同性恋者进入学术界,站在反异性恋中心的立场表达不同的声音;同时,由于科技的发展,通过手术改变性别成为可能。随着跨性别、同性恋、性存在问题受到学术界的关注,酷儿研究发展成为一个理论体系,关于“新社会性别政治”的讨论为社会性别研究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性别不仅仅是关于男人之于女人的差别,也不只是男人之间和女人之间的差别,而是个体本身的一种流动、可变化的特征。准确地说,新社会性别政治是对身体和性别之间存在“天

然”联系的一种挑战,因而挑战了将社会性别看作任何男人或女人内在属性的定见。

在授课过程中,斯泰西教授从自己的教学研究经历出发,总结了在各种力量的推动下女权主义学术在美国经历的几个发展阶段。她在 25 年的时间里曾经任职于三所高校,都是受聘于社会学和跨学科女权主义项目的联合职位——80 年代和 90 年代初期在加州戴维斯分校时项目名称是“妇女学”,1997 年调入南加州大学时是“社会性别学”,而 2003 年到纽约大学则是“社会性别与性存在学”。现在,她的履历表上标注的是“社会与文化分析教授”。学科名称上的变化事实上是对社会性别研究中发生的重要变化做出的回应,表现出社会性别学科不断延展的关注对象——从妇女研究出发,融合多元族裔研究、同性恋与性存在研究、男性研究等不同领域。《社会性别与社会读本》全书共五个部分,从女权主义和社会性别对社会和知识生产的影响、女权主义的去中心化、酷儿问题、全球化等角度呈现女权主义学术不断延展的关注领域,最后对“社会建构”这一经典的女权主义命题进行重新思考。

第一部分“西方女权主义和社会性别研究”包括“社会性别与父权制是普遍存在吗?”和“透过社会性别看社会与知识”两个议题,所选文章写作于 70、80 年代,展现早期女权主义关于父权制社会的认真思考,揭示女权主义的介入能够如何改变关于社会生活的理解,以及如何为不同学科的知识生产带来新的活力。其中奥特纳的“女性之于男性是否有如自然之于文化吗?”一文发表于 1974 年的《妇女,文化和社会》,是女权主义学术的经典之作之一。在文章中,作者以人类学家对跨文化比较的敏锐研究所有女性负责照顾人的文化,从而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虽然不同的社会关于育儿的理解不同,但是什么导致由妇女承担养育之责?基于对女性的生理特征、社会角色和心理更接近自然的分析,她给出了这样的回答:所有文化都认为女性更贴近自然而男性贴近文化——一个引发广发争议、作者本人于 1996 年再度反思的结论。通过“与父权制博弈”一文,我

们可以窥见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对父权制普遍存在这一论点的反对。丹尼兹认为,各种社会中制度、性别、亲属关系、男性统治情况不一,男权制在不同地方有所不同,从而赋予妇女不同的“游戏角色”,而妇女也就有了不同的反抗策略。因此,有必要对女性的策略和应对机制系统地进行比较分析,在某些形式的男权制下,女人有自主和权威,而经典男权制是最不利于女性的一种制度。

“透过社会性别看社会与知识”的议题选择的两篇文章都是斯泰西教授本人的作品,以此为例分析不同的女权主义概念体系如何提出不同的问题,以及女权主义如何发展不同的研究。“寻找关于家庭与革命的新理论:思考中国案例”是在关于父权制普遍性这一问题的激发下开展的,研究方法是历史社会学,目的是研究革命对社会性别和家庭的影响,与1970年代主流家庭社会学中的家庭现代化理论进行对话。在当时有限的研究条件下,她选择中国革命为研究对象,指出家庭现代化理论的错误,认为并不是西方现代化将现代化模式从西方带给世界,在中国是社会主义革命改变了儒学和提高妇女地位,据此挑战了主流社会学关于革命和家庭的理论。另外一篇与巴瑞·索恩合著的文章“社会学中女权主义革命的缺席”不是研究性论文,而是回顾总结女权主义在社会学与其他三个领域中带来的影响,反思社会学中女权主义的发展状况,认为与历史学、文学以及人类学相比,社会学中的女权主义被收编、隔离,并分析了功能主义带来的局限性。这篇文章以不同学科的视野审视了女权主义理论范式在知识生产中的作用,发表后广受关注。

第二部分“西方妇女和女权主义理论的去中心化”包括三个议题:“批判性的交叉立场”、“性政治:西方女权主义与反女权主义性政治”、“全球性政治”,针对早期女权主义知识中白人妇女理念的普遍化,呈现在种族、性存在、全球化几个不同的位置上对早期西方女权的“西方、白人、中产阶级、同性恋”中心的批评。其共同点在于认识到早期女权主义理论之为“女人”说话,其实是为某一特定群体的女人说话。“交叉性”关注的是不

同压迫体系之间彼此的关系和相互的影响,第一个议题下选择的两篇文章呈现基于不同种族、族裔、地域的考量对社会性别问题的思考。第一篇从多种族女权主义的理论框架出发,试图超越单纯对妇女之间多元性和差异的认识,以考察统治结构的形成,理解在社会性别的社会建构问题上种族的重要性。这一框架提供的不是单一或一元的女权主义,而是一个知识体系,将妇女和男人都安置于多重的宰制体系中。“多种族”强调作为权力系统的“种族”与其他结构化不平等机制相互影响,形成各种“社会性别”。“家庭的联结/概念的束缚:女性主义认识论的非洲笔记”一文的作者则站在一个完全不同于西方文化的框架下,从非洲经验出发,发现女权主义的“妇女”概念中“普泛”性意义的局限性,对此提出了尖锐的批判。她挑战了“妇女”与“社会性别”这些基本的女权概念,认为这些都是西方的概念,不存在普遍的“社会性别”或“妇女”。

为“性存在:西方女权主义与反女权主义性政治”议题选择的两篇文章分别讨论性旅游和同性恋问题。“性旅客、移居国外者、他的前妻、她的‘他者’:丧失、差异和欲望的政治学”一文的作者是一位英国女权主义学者,该文提供一个优秀的交叉性女权主义个案研究,以异性恋欧美男人到贫穷国家进行性旅游为研究对象,分析两个社会不平等的经济地位如何给这些白人男人机会,通过得到当地女人的性服务和对妇女的交易来重建男性特质;说明在种族、性别、阶级、经济地位等因素的相互交织下,这些男人来到异国他乡——他们能够将女性物化、获得绝对控制权的地区,而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这些白人异性恋男人的反女权情绪。“父母的性取向(如何)有影响?”是一篇关于同性恋家庭研究的范例,在文章中,两位作者讨论了已有研究关于父母的性倾向对子女的性取向和性行为带来的影响。她们考虑了各种不同的概念框架,评估了自1981—1998年间就此问题开展的21个心理学研究——父母的性取向如何影响子女,得出了一些有意思的发现。虽然反同性恋权利的人们声称同性恋父母抚养的子女受到负面的影响,但是大多数的心理学研究得出的结论却是同性恋

父母和异性恋父母抚养长大的子女的发展并没有根本差异。但是,秉持着严谨的学术态度和批评性思考,两位作者指出:由于这些研究本身在方法上的局限和防御性,以至于未能对差异进行充分讨论,研究人员可能错过了一些更加富有启示性的结果。

第三节“全球性政治”的两篇文章分别讨论台湾同性恋身份政治、男性特质,试图从西方的“异域”、“他者”的立场与西方女权主义学术界关于家庭和性别的研究对话。“光鲜的主体”一文通过分析一个非常流行的台湾同志杂志《热爱》(G&L)所显现的文化假设,研究了台湾同性恋的身份建构,尤其是在孝道依然是台湾社会文化构成和个体主体性的核心的背景下,关于消费、家庭生活以及关系等问题。如果说美国同性恋边缘化的原因以宗教为基础、受阶级影响和被医学病理学定义的同性之恋,台湾酷儿的困境有自己的本土特色,原因是他们背离了深受儒家学说影响的、以异性恋家庭为核心的传统社会秩序。

在去除西方女权主义中心的过程中,男性研究的出现标志着社会性别研究走出对单纯对妇女的关注,将两个性别共同放置于动态的权力结构中进行考查,强调男性特质的多元性和等级制,以及其集体和动态的特征。“男性特质与全球化”最早在 R. W. 康奈尔的努力下进入研究的中心,在这篇文章中康奈尔提出,存在一个全球范围的社会性别等级架构和不同形式的男性特质,关于全球性别秩序的理解是基于全球思考男人和男性特质的必要基础,有必要发展超越基于本土的近焦研究方法,在全球性别秩序的不同历史阶段探寻全球化男性特质的出现。他把全球男性特质分成三种基本形式,认为欧洲的殖民扩张分三个阶段形成全球社会性别秩序的基础——第一阶段是殖民者的登陆与居留(征服与殖民居留的男性特质),第二阶段是在新大陆建立殖民社群的期间(帝国的男性特质),第三阶段是随着全球市场的形成、殖民地的独立而产生的新影响(后殖民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男性特质)。他认为:当代性别秩序中的霸权与贸易、投资 and 商业化相关,而这些都是由北方国家所控制。跨国商业男性

特质在体制上以跨国公司和全球金融市场为基础,是全球层面正在出现的主导男性特质形式。

社会性别秩序指的是关于社会性别身份的社会文化建构,以及与社会性别差异相关权力与特权之间制度性的联系。如果说女权主义第二次浪潮挑战并颠覆了使妇女在经济上、社会生活和政治上处于劣势的父权制文化和法律规定,那么酷儿运动则推动更多元、流动、不以固定性别身份为基础的性别秩序的出现。新社会性别秩序挑战、撼动原有的本质性范畴,坚持认为:社会性别并非男女二元的既定范畴,而是多样的,并且不直接和身体相关。在此基础上,社会与文化都开始重新思考二元的固定性别身份,允许各种不同的家庭安排和性别关系的存在——比如同性恋家庭。第三部分“酷儿问题和新社会性别政治”包括三篇文章,分别讨论两性婴儿的性别管理、工作场合的变性人与男同性恋家庭问题,呈现的是随着酷儿学术和社会运动的发展,关于社会性别身份与社会性别政治的重新思考。“性别的医学建构:两性婴儿的病例管理”一文以如何对出生时性别特征不明确的婴儿进行性别分配为研究问题,通过在医院开展的田野调查和对医学专家的访谈讨论性别指定的医学化问题。作者指出,在为婴儿进行性别选择时医生的专业知识以及他们身处其中的社会文化因素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医疗上对中性婴儿的处理,最终取决于文化对性别理解。由于希望建立起二元对立的社会性别概念,孩子出生不久就确定性别,并通过手术进行干预,此后在现实生活中进行建构二元对立的社会性别及性别认同。作者呼吁保持性别的多元性,认为医学管理要尊重个体的自主权,提倡在青春期再做出医疗决定,由每个人自己进行选择性别,而不是由社会进行强加。作者提出要打破身体和社会性别的联系,最重要的是自己对身体的自主权。“仅仅是男人中的一个吗?——变性男人如何在工作中显现社会性别”通过对工作场所中女变男的变性人(FTM)的访谈,揭示了男权制红利的运作。FTM的个